

罗哲文与赵州桥的情缘

赵志勇

“环球第一敞肩桥，四穴平弧形式娇。最是雕龙栏柱巧，若飞若动压洩涛。”这是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初，罗哲文为制定赵州桥的抢险维修方案，第二次到赵州桥考察，并在桥下挖出了隋代的栏板望柱后写下的一首小诗。从他一九五二年第一次考察赵州桥到今天，整整六十年了，其间，罗哲文先生又曾数度到赵州桥访问、考察，与古桥结下了一份深深的情缘。

青年时代便与赵州桥结下不解之缘

罗哲文才十七八岁的时候，考入中国当时唯一的古建筑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是学社最后招收的学员，师从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梁思成从绘图板、丁字尺、鸭嘴笔的使用到削铅笔、擦橡皮这样琐碎、细小的事，都耐心地手把手向罗哲文传授经验。从入门起，罗哲文就受到了规范的训练。梁思成把罗哲文引入了广阔的建筑艺术殿堂，他和罗哲文谈线条的艺术性、图纸的艺术性，罗哲文领会着建筑艺术的美，开始着迷于古建筑研究。

罗哲文曾回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自己跟着老师梁思成学习古建筑的时候，就被办公室墙上的赵州桥的图片所吸引，当年，梁思成正把这一独特结构的古桥写成一个很长的报告，在一九三四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刊发了，梁思成还曾亲手教罗哲文为赵州桥描绘图纸。

新中国成立后，罗哲文调到国家文物局，从事古建筑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并参加了长达六年的赵州桥维修工程。六十多年过去了，从前那个稚气未退的好学青年已经成为中国古建筑界的泰斗级人物，但对那种结构独特、人不知其所以为的古桥形象仍然记忆犹新。他经常给人们介绍：“《石桥铭》中是这样说的，‘两涯嵌四穴’，就是两边四个洞；‘以杀怒水之激荡’，就是说减小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它的科学价值就在这儿。这种结构名为敞肩拱，这是赵州桥最突出的特点。”

罗哲文说，恩师梁思成第一个发现了赵州桥。这是他在对古建筑实地考察研究中发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了不起的建筑。现在所有研究赵州桥桥梁史的专家，都是从梁思成先生的考察报告中得到的知识，得到的成果，赵州桥的发现梁思成的首功是不可磨灭的。

梁思成对赵州桥的发现和推介，让年轻的罗哲文与赵州桥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罗哲文也成了赵州桥的研究者



罗哲文

和宣传者，成了赵州桥话题里提到最多的名字之一。

五进赵县，参加赵州桥最大的一次修复工程

鉴于赵州桥在世界桥梁史上的划时代地位，文化部决定派专家到赵县调查赵州桥等文物保护情况。一九五二年八月，罗哲文、祁英涛、里正等从北京风尘仆仆来到赵县，这是罗哲文第一次与赵州桥相会。同年冬天(十一月七日至十四日)，文化部再派专家刘致平、罗哲文等十一人实地考察、勘测赵州桥等文物，考察结束后集体写出报告，建议国家修缮赵州桥。他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六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千秋史话》里回忆说：“一见到赵州桥，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的确是惊叹不已。因为文物必须得看原物，用现在的话形容，哇！这了不得，的确是这心情。”罗哲文对赵州桥一见钟情的心情溢于言表。

一年后，罗哲文一行再度勘察赵州桥，先后四次挖掘，自桥的上游至下游十五米内，挖掘面积一千二百平方米，由三米至四米深的淤泥直挖至河床的硬土层。“这次勘察，发现了很珍贵的文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隋代的栏板同它的望柱，这个栏板是雕龙栏板，有穿龙、有蟠龙，也有对龙，还有龙柱。”一九五三年三期《文物》上发表了罗哲文等勘察人员撰写的《赵县安济桥勘察记》，在挖掘勘察的基础上，制定了保持隋代原貌的修缮方案。从一九五五年六月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国家投资对赵州桥进行了全面修缮。这次修缮是建桥一千四百年来最大的一次修复工程，古桥得到了科学的保护加固，同时，基本保持了原来壮丽雄伟的风貌。

时间到了一九九一年十月，赵州桥再度迎来了金秋的收获。它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选定为世

界第十二处“国际历史土木工程里程碑”，并赠送铜牌立碑纪念。这年十月三十日，头戴浅灰色鸭舌帽，脖子上挎着相机的罗哲文先生走上赵州桥头，并在纪念铜牌前留影。他兴致勃勃地对陪同的人们说：“中国古建筑的技术水平非常高。秦汉时，就有建设一百多米高楼记载。我想当时在隋代，或者隋代以前，也许还有比赵州桥更大、更好的工程。但是仅仅就赵州桥的科学水平、艺术水平来说，那是无与伦比的。公元七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隋王朝时代，当时的建筑技术日趋成熟而又富有创造性，精美的桥梁建筑随处可见，而赵州桥为破译古人建桥技术提供了最好的实例。隋代的设计师与建造者们驾轻就熟地使用着石拱券这种古老而又坚固的建筑结构，同时又采用难度极大的大跨度弧线，巧妙地使这座巨大的石砌建筑看上去是如此的轻巧与和谐。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聪明的中国人使用了拱上加拱的特殊设计，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个了不起的发明。”此后，《璀璨时刻》——石家庄历史文化影像志》摄制组，采访了罗哲文先生，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赵州桥：“新中国成立后，赵州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州桥对我国乃至世界桥梁建筑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选定赵州桥为‘国际历史土木工程里程碑’，在中国尚属首例。”

罗老最后一次走进赵县是在二〇〇五年的六月一日，赵县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时候。当时，他的身份是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我也投一票，赞成赵县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专家评审会上，罗哲文先生饱含深情地说，“我对赵县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五十多年来，一直到现在我也经常在一些场合宣传它，赵州桥是第一批国保单位。当时，我是参加了评定，那时的唯一标准就是拔尖，这个没有话说，赵州桥人选是没有问题的。”

这次会上，赵县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专家评审票通过了，赵县正式进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序列。评审会后，身穿白色衬衣套灰色毛坎肩，着米黄色休闲裤的罗哲文，胸前挂着那架不离身的照相机，健步走上赵州桥头，似乎是很想来祝贺这位一千四百岁的老朋友再交好运！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六日，八十三岁高龄的罗哲文先生欣然挥毫，为历史文化名城赵县牌楼题写了牌匾“赵州历史文化名城”，表达出这位耄耋老人对古赵州和赵州人民的真挚情感。

把对赵州桥的爱融进血脉中

罗哲文先生的住宅里有一个袋子，被他戏称作“宝贝袋”。那里面装着我国各个时期的文物法。其中还有订书钉都生了锈的一九五二年赵州桥的档案和勘察报告，抚摸着这份已经泛黄的资料，罗老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太重要了。”可见，老人已把他对赵州桥的爱融进了血脉里。历次考察赵州桥他都为保护和利用古桥提出过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比如，先生建议赵县搞一个旅游规划。他认为，旅游同文物保护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旅游发展靠文物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没有这些资源，旅游就不可能发展。他说，试想赵县没有赵州桥，那谁还会来看？旅游靠文物发展，文物则借助旅游去发挥它的作用，体现它的价值。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就不能创造出一项伟大的工程。人们只有亲眼看到赵州桥，才能感觉到，有了我们这样一个聪明智慧的伟大民族，才能建起举世闻名的赵州桥来。旅游规划是一门学问，要在文物保护的规划基础上，要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础上，来搞，真正做到双赢、两全其美。

比如，先生建议加强文物研究。他认为目前对于赵州桥的研究还不够，与赵州桥有关的档案资料还要继续收集和整理，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今后我也会再提供一些桥的档案资料给你们，文物档案资料一定要做好，做扎实，包括历代和古今来的文献资料。”

比如，先生建议赵州桥周边环境要改造一下。有些树不要栽得太近，一是直接妨碍桥基，另一个是看不到桥的全貌。还有李春塑像应该放置在离桥近一点的地方，‘八仙’只是个传说，不要搞得太突出，要突出真实和主要的。

比如，先生建议修建桥梁博物馆。“我可以带头呼吁一下，这也是茅以升老先生的愿望，如果能建成，那就是中国顶尖的。过去计划在国内建桥梁博物馆时曾选了三个地方，一是卢沟桥，二是洛阳桥。但赵州桥是顶尖的，我本人建议在这里建桥梁博物馆。因为，赵州桥可以说是工程技术上的尖子、文化艺术上的尖子和历史文化上的尖子，三大价值兼而有之。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古代桥梁建筑成就，而是代表了工程技术的最高成就、科学的最高成就和艺术的最高成就。”

罗老走了，赵州桥还在，它默默地讲述着古桥创造者的聪明智慧，也见证了茅以升、梁思成、罗哲文等一代代古建筑守护者执著和忠诚的坚守。

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地球就是个圆石头，平是地，凸为山，凹成海。人类始祖，就是从散落在这圆球上的一颗颗石子里迸出来的，而石子们在孕育新生命后，则飘向了浩渺太空，只在夜幕降临时，才悄悄用星星点点的目光，向人类遥送着绵长的眷爱……一颗石子一条生命，一条生命一颗星，我对石头最颠覆的狂想，也仅限于这个美丽的传说，即便很早就从书中知道人类从匍匐到直立行走，就是演绎在那最远古的旧石器时代，是石，录下了人的第一次直立行走的蹒跚足印。然而，让我对随处可见的石头真正起了敬畏之情的，却是一块凹石。

凹石就摆在贾平凹先生家客厅里的会客桌上，色泽有墨亮，间或也有缕缕云的灰白；石中有凹，凹底同样圆润平滑，除此，我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不懂石，即便有块价值连城的宝石放在我面前，倘若没有内行指点，我也绝不会将它尊贵起来。令我产生兴趣的是，先生将其置于朋客之中，于渺渺若香间，人对石，石对人，人石缠绵时，是为观石悟人，悟石观人？

我认识先生是在三十年前，当初我识他，正如我一贯对石的肤浅，只觉得他是个普通到让你认识了就会很快忘掉的人：布衣一介，而立之年的生动和英气，全都掖在了还掉着土渣的淳朴里。当时没听到他说一句话，即便象征性地同我这个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小编辑握手时，笑得比我还要腼腆（其实那时他已获得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幸好当时留了个黑白合影，否则，随后，当贾平凹这三字，一如列星陨落，不断搅动着文学这潭水，一如羊肉泡馍的膻腥，频繁挑逗着受众的神经及心理时，我会很犹豫去将当时的淳朴腼腆与之后的中天之日叠合起来。

三十不识石，识石又三十。三十年后的今夏，当我再次面对先生时，竟发觉他曾经的一个普通到过，钝涩言辞，腼腆含笑，静静地听人说话，平和地面对仰慕和恭维，其间来了几批凹粉请求签字合影，他一律恭敬从命，令我在来途中生出的会被烈日暴晒一番的惶恐，一下子就让这如月般的亲善化解了。三十年间，我与先生未曾谋面，这次再见，我万没料到，被文学重彩涂抹和用重彩涂抹文学的他，除了添加了不少岁月逝去时留下的痕迹外，其他种种，竟依旧是老照片中的那个。倏忽间，我觉得先生与这桌上的凹石，真有一比。

凹石稳重地端坐在朋客之中，妙语环座亦不动，皆以淡定通晴阴。看着它的凹状，我脑里不知怎的，蓦然浮起在海口马鞍山看到的火山口。它神秘地缄默着，让人在揣摩它的过往的同时，又在心跳它在某一刻会再次惊天动地；它不邀众赏，大形无声，既不以曾经的一柱冲天狂悖于世，更不用浮华之气乱相众生，它平和地接纳每一次的靠近，淡泊地容纳心头评定，它甚至喜欢你深入它的内心，用同样缄默的钟乳石，引你去觉悟历史的斑驳和造化的神力。它缄默，可这是何等神圣的缄默呀，缄默得让你敬畏，缄默得让你惶恐，也缄默得让你期待，因为你分明能从这缄默中听出岩浆仍在涌动，感到又一次惊世骇俗的天问，将会不期而至，而每次天问后留下的作品，便是凝固在它身旁的那些不朽的熔岩流了……面前这块凹石，不就是个压缩版的火山口么？我想，它也曾有过许许多多精彩的喷发呀，《废都》、《白夜》、《病相报告》、《秦腔》、《高兴》等等，我数不清，恐怕先生也很难脱口就说出了。

坐在身边的朋友告诉我，这凹石原是别人收藏，名为八音聚宝盆，自先生收了后，此名便被废了，顺其

自然，从此就以凹石相称。我不知先生为何要废了那名，是嫌其太张扬功利，还是因与自己生性难合？但我略知，乐器的诞生就源于石头，在远古时期，原始先民们学会了用石头狩猎，由于有些石头上生就天然形成的空腔，当石头像流星一样飞向猎物时，气流穿越空腔，便形成了哨音，而正是这纵横呼啸的声音，在维持先民们生存的同时，也启蒙了他们的音乐天赋，开了他们制作乐器的灵感。这或许又是个传说，但我相信，石头是天造之物，由它先发天籁之音，自然是当然之事……也许是先生察觉到我正耽于凹石之中，便随便拿起个烟斗样的东西，在凹石上随意敲打出几种声音。坦率地讲，这声音说不

一支怎样的绝响，因为，我都已经替他累了。

我抽暇浏览了先生收藏的宝贝，陶罐瓷瓶木雕字画等等，看完了也就愈加让我发疑，有这么多看就知道价值不菲的古董，先生为何偏把这普通的凹石放在这打眼位置？是不是……就因为先生的名号中也含个凹？我读过一篇写先生的印象引为类的短文，对凹字，文中引《易象》说：“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施平。”这一说固然精妙，但仅突出个谦来，读了让我总觉得对凹字解得尚不足。我看这石中凹，凹中空乎也，一下子让我的遐想不知怎么又会跳到佛门食器钵多罗上去了。十多年前，我与朋友们一起上了五台山，烧香拜佛自然少不得，抽签时，竟得了个上上上卦，惹得举目皆惊。信则有，不信则无，自那次，我对佛学有了些许兴致，起码晓得“真空不碍妙有，妙有体现真空”的佛家所崇尚的空性。我由此臆想开去，仿佛看到先生手捧钵多罗，以虔诚情怀，行走在峭崖幽谷清流崎路之中，化来天之灵气，缘结地之丰沛，而后，就让这化缘来的大有再从笔尖统统流泻出去，文学出高兴的刘高兴、浮躁的金狗、古炉村的善人、废都里的庄梦蝶等林林种种的人物，将他们又返还于天地之间……我不清楚先生是否笃信佛理，但仅从这石中的凹，我似乎已经读到“空有不二”的境界了。

我把随身带来的照片给先生看，他接手时，眼睛里先跳出了一缕惊喜，然后就将它举在面前，凝眸细端详起来。他看得很认真，也看得挺久，似在寻找，似在思索，又似在重现当时的场景，脸上没有特别的表情，一切情绪都深陷在了黑白记忆里。看罢，先生就掏出



三十年前的贾平凹(左一)和本文作者(右一)

上优美动听，每个音符跳出来后，都坠着沉重，给人一种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压抑感。据说先生闲时，就爱轻轻拍拍它，听它唱一首。莫非正是这几个沉重的音符，恰能随时帮他释放这多年来，一直肩担着仍还荒唐却很美丽的商州，思考得沉重写得沉重以及写完后再还要面对毁誉参半的沉重么？自《满月儿》第一次获全国性大奖后，各种国内外奖项追着岁月的脚步如潮涌般到来，记得先生在《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发出过这样的感言：“多出书和多获奖可以令人成名，但成名并不等于成功，关键是出版的书能不能长久地被读者阅读，阅读后能否给人心灵上产生启示和共鸣。”这话容易被理解成谦虚，但细品，却又是一份用盛名换来的沉重……竭全心之力，举中国文学之重，先生不敢潇洒，他说他又有一部暂命名为《皮凰》的长篇小说要面世。我不敢深问，只暗自揣度它又将是

临别时，先生站了起来，似是要给我个交代，伸手轻抚着凹石，低声对我说：“它就是我，我就是它。”对此说，我并不惊讶，只报他个会心的笑。先生大概不知，这快三个小时的客坐，先生与凹石，已在人眼里融为一体了。我是个女人，女人的思维易飘逸，凹石在我的脑里，忽而火山口忽而琴又忽而钵多罗，即便如此，我仍无法完整地读透它。但此行，我能从先生的身上，再次读到三十年没变的如石的朴素，如石的沉稳，如石的坚实，如石的神秘，我亦足矣。

我与刘绍棠、刘振堂的交往

周鸿声

我认识两个姓刘的作家朋友：一个是出生在大运河畔的北京通州刘绍棠，一个是出生于拒马河发源地河北涿源县的刘振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刘绍棠就读过的河北通县潞河中学和我在读的河北宣化中学(现改为宣化一中)都是人才辈出的百年老校。当时河北省各个重点中学很流行校际交流、相互学习。一天，我突发奇想，把我发表在《张宣日报》副刊上的一篇习作《在未落成的宣化五一广场》和《未落成的宣化人民公园》两首诗寄给绍棠，想得到他的指点。绍棠很快回信了，还说出了他的看法：“你的诗很有感情。因为你亲自参加了修建宣化人民公园的社会公益性劳动。”当时我对我说的话未过多去想。后来考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系统地学了文艺理论才明白：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若无对社会生活的亲身体验与深入了解，写出来的作品就苍白无力，就无法感动读者。这件事过去已有好多年了，当时报社寄给我的信和报样，“文革”后已荡然无存了，诗的内容也记不清了，经反复回忆，只记得是自由体，句旁有几十行，零零星星有这样的句子，今天看来很幼稚，甚至词、句也不通，我想当时编辑之所以发表，旨在对

我的鼓励吧！”啊，在未落成的宣化五一广场上，/每当晚霞升起的时间，/人们三三两两，/人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广场上，/有的跑、跳，/有的歌唱……啊！未落成的宣化五一广场，/你像一张软绵绵的床，/惹得我很想在上面躺躺，闻闻泥土的新香……今天，我们肩抬大筐脚踩臭泥，/明天，绿水、轻舟、岸柳相依。/或许几十年以后，/带着子孙又在这儿相聚，我们将自豪地对孙儿”说：/这儿曾洒下过爷爷青春的汗水！

我来自北京后，在一所大学和老舍的二女儿舒雨教授给中外比较文化的硕士生开设专业课，后又到《中国文化报》任文化理论部主任、总编辑助理、执行总编辑，我和绍棠“以文会友”的机会更多，彼此来往更频繁了。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乡土艺术协会成立大会，绍棠被选为副会长。会后他请我去他那儿兼职，我因工作太忙未能应允。又有一次在前门西大街老舍茶馆开会，我和绍棠、苏叔阳、宋丹丹的父亲宋汎老师等都坐在主席台上挨个儿发言，会后，时任北京市文联党委书记的宋汎老师问绍棠：“你怎么一边发言一边盯着手提包？里面装着什么秘

密？”绍棠哈哈大笑说：“什么秘密呀！是给周老师的个聘书。”他边说边把一个写着北京市写作学会高级顾问的聘书递到我手上，笑着说：“周老师，这次您不能再谢绝了吧？”在这前前后后的几年里，我把他的《蒲柳人家》小说稿在《中国文化报》副刊上连载，我也应邀常去他那里的讲座，交往一直到驾鹤西去。

八十二岁高龄的刘振堂，是土生土长的涿源作家。他出生在人迹罕至的“飞狐峪”南侧的深山老林深处，当过小学教师、校长、涿源县水电局局长、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县委办公室主任等职务多年，成天在基层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摸爬滚打，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工作之余，经过多年收集采访、座谈、思考写出四十八万字《奔腾的拒马河》，已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纪实性历史长篇小说，通过河北涿源八年抗战所发生的事件，体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艰苦卓绝地走向最后胜利的历史进程和斗争经历。

被恩格斯誉为“迄今为止，所时代最有学问”的十九世纪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说：“在相同的事

物中找出相异的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从相似的事物中找出相异的事物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这里，我并不想把刘绍棠和刘振堂两位作家做比较，说谁的作品好，谁的作品更好，我只是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却忠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进入耄耋之年的刘振堂近年来笔耕不辍，著作甚丰。最近欣闻，他经过几年的收集、采访和思考，又一部新作《毛泽东的故事》已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这首诗中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读了刘振堂写的《毛泽东的故事》，使人对这两句颇具人生哲理的诗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以文见人，以文生情，从中反映出毛泽东那博大胸怀和无私的胸襟，虽然讲述的都是毛泽东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却提高到了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和反腐倡廉的大政方针。以物说事，以事明理，以理感人，形成了乡情、亲情、民情、闲情和国家国情，让人感到亲切、温馨，展现出一代伟人的大爱、大智、大才和大德。